

学术综述

近二十年来敦煌汉简研究综述

裴永亮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从《敦煌汉简释文》《敦煌汉简(全二册)》出版到当下,以其为一手材料,对汉代敦煌地区的屯戍、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文学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存在问题。以下就近二十年来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

关键词:敦煌汉简;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5)02-0121-06

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末,甘肃河西走廊疏勒河流域的汉代长城边塞遗址共发掘出土汉简八批,出土汉简计2485枚,因大都出土于汉代敦煌郡地区,故统称为“敦煌汉简”。

八次发掘计为1907年、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以北汉代烽隧遗址获得汉简708枚、84枚,以及在安西、酒泉获的汉简105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发掘汉简17枚;1944年,西北科考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发掘汉简49枚;1977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汉简91枚;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的马圈湾,出土汉简1207枚,新编号为DZ1;1981年,敦煌县博物馆在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获汉简76枚;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零星汉简137枚。以上八次发掘共计出简2485枚,另外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因数量巨大故以其发掘地命名为“悬泉汉简”,故不纳入本文“敦煌汉简”之中。

根据出土的纪年简可知,其中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以西汉武帝、昭宣、新莽时期及东汉早期的简牍为主,这批珍贵的简牍包括的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十分宽广,对于两汉史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其内容主要为武帝后期开设的

敦煌郡、酒泉郡屯戍活动的记录官私文书,如官府往来文书、诉讼文书、私人书信、借贷的契券;另为簿籍,包括戍卒的名籍、廩食簿、守御兵器簿等;还有典籍《易》、《力牧》、《苍颉篇》、《急救篇》、《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及相剑刀、相马的书籍。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古代典籍的珍贵资料。

1991年年11月,《敦煌汉简释文》《敦煌汉简(全二册)》相继正式出版,此后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热潮。下面就将近20年来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简要归纳总结。

一、敦煌汉简研究的相关专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的敦煌汉简专著的书是吴初骧、李永良等的《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01月第1版),将1907年斯坦因盗掘到1988年敦煌博物馆发掘的八批出土的汉简收录期中,缺点是只有释文,没有图版。紧接其后甘肃考古所出版《敦煌汉简(全二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1991年06月第1版),弥补了前者的不足,共提供图版207幅,释文2485枚,模本12版。

饶宗颐、李均明的《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版)属于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该书收录了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可以确定年代的五百例简文,按照年代顺序排

收稿日期:2015-02-26

作者简介:裴永亮(1981—),男,山西大同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简牍学。

列。年代上限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下限为恒帝永兴元年(153年)。释文都根据图版进行了校订,简后附有作者按语,主要为确定年代和分析内容。该书为简牍文本按编年形式编排的首次尝试,为简牍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3月版)出版,为系列丛书《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之第二册。敦煌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共有汉简1217枚,该书是对敦煌马圈湾汉简的深度整理和研究,主体由图版、释文、校释、集解、今按五部分构成。首次全部公布了马圈湾汉简的原大彩色图版和高清红外线图版。可以说该书提供了目前这批简的最准确的释文,纠正了此前不少误释,并补充了许多新释、漏释。对一些非常专业的字对词进行了注解,并提供了马圈湾汉简统编号与原始号对照表和词条索引,便利了读者的查阅。

二、敦煌汉简与语言文字学研究

(一)语法研究

魏德胜《〈敦煌汉简〉中的量词》^[1]对《敦煌汉简》中的量词进行列举,认为量词使用广泛,且与名词间有很强的选择性,量词简明、规范,成系统,从而加深对上古量词发展的认识,或可补传世文字资料的一些缺漏。曹小云、邢会娟的《〈敦煌汉简〉中的联合式复音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从语义、词性、字序三方面论述了《敦煌汉简》中联合式复音词的构成。马秋红《〈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按照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对《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进行了穷尽性的搜集和整理,并按其在句中的语义特征进行分类,并分类解释这些助动词。范董平《〈敦煌汉简〉谦敬词的修辞特点》(《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通过对西汉末年西北边塞军旅文书《敦煌汉简》中谦敬词的调查,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下层社会谦敬语使用情况的真实面貌。肖从礼《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主要以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为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了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的种类和各自的使用特点。

(二)字形字义研究

杨艳辉、张显成《敦煌汉简的异体字——兼论

异体字的认定问题》^[2]探讨了敦煌汉简中的异体字,对异体字的定义、异体字与正字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对敦煌汉简中的异体字进行了分类研究,分析了异体字产生的复杂性,指出应根据切实可行的认定标准慎重地处理异体字。曹小云、邢会娟《敦煌汉简词义札记》(《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年第9期)对敦煌汉简的词汇进行讨论,探讨敦煌汉简中为《汉语大词典》未收的词目,补充见于敦煌汉简而《汉语大词典》未收的义项,并依据敦煌汉简提前《汉语大词典》始见书证的时代。杨艳辉《〈说文〉新附字新考例——以敦煌汉简为主要材料》(《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就敦煌汉简材料中出现的《说文新附》八字“涂、价、铭、坊、馊、槩、棹、儻”,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材料对照,再次考证,以确定此八字在汉代是否确实存在。王姣《敦煌汉简通假字文字学初探》(《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3年第12期)从通假类型与形体结构对通假字与被通假字的关系进行归类,阐明通假字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字学意义。

(三)训诂学

朱湘蓉《从敦煌汉简看里耶简文书词语的训释》(《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通过敦煌汉简中的相关材料,运用词语互证的词义训释方法,对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文书简的一些词语试作训释,为这些词义的解释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文中主要运用了敦煌汉简和里耶秦简材料,通过词语互证,相互比较,辨析验证,考察了“报”“来”“走”“谓”“告”五个词语在秦简文书中的特定含义。秦凤鹤《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校订》(《中国文字研究》2014年第2期)结合红外线图版及相关研究论著,对敦煌马圈湾汉简进行研读,同时对其中24条释文予以校订。

(四)词汇

吉仕梅《王莽改制在居延敦煌汉简词汇中的反映》(《学术交流》2008年第4期)将王莽建立政权后,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中对职官、地名、货币等称谓的改动进行了文字学分析。

三、敦煌汉简书法研究

(一)书法书籍

马建华、赵吴成《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刘云石作书评《汉字书法的珍贵史料——〈敦煌汉简书法精

选》(《美术之友》1997年第1期)从敦煌汉简中,选出的最精采、最完美、最具代表性的简牍,以及不同书体、不同类型的“简书体”字例编纂而成,《敦煌汉简》是探讨我国古代书法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胡之《甘肃敦煌汉简》(一至四)(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6月出版)是《中国简牍书法系列》之一。它反映了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在秦至两汉魏晋这个大变革时期的生动面貌,读者不难从中发现中国文字和书法的衍变脉络和发展线索。该套丛书为8开全彩版印刷,每页均附释文。

(二)对书法的专题研究

李逸峰《敦煌汉简草书略论》(《简牍学研究》2014年)通过对敦煌汉简中草书简书写形态、用笔状况与结字布局等情况的考察,发现当时草书符号已达到较高程度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在此基础上,部分草书简书写熟练,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汉代草书蔚成风气,其形成与隶书字体的演变相辅而生,是汉字书写隶变与草化的结果。

史忠平、马国俊《从汉代书论窥探敦煌汉简的“民间性”》(《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就敦煌汉简的“民间性”问题进行论证,区分了书法中的官方书法、文人书法、民间书法之间的界限。

四、相关问题研究

(一)职官与俸禄

任攀《敦煌汉简中有关汉代秩级“真二千石”的新发现》(《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通过《敦煌汉简》1108号简文中旧缺释的四个残字释读,认为这条材料对于“真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真二千石”一秩的淡化或消失很可能与州牧的废置有很大的关系。到东汉末年,存在以中二千石之秩居州牧之职的现象,州牧的秩级、“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关系以及州牧、刺史交替或并存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张伟的《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安康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汉代在河西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考虑到河西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职官设置上多有变通,适应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需要。文中根据敦煌汉简,对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进行了梳理,认为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可以分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行政系统为郡县制度,军事系统为都

尉—候官—候长—隧长的体系。

(二)农商业相关问题

1. 物价

侯宗辉《从敦煌汉简所记物价的变动看河西地区经济的起伏》(《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通过对敦煌汉简有关物价资料的梳理,连同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同类物品价格类比,并与粮食价格、同时代物品价格比较,发现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敦煌汉简中的物价皆波动明显,而且敦煌与居延两地之间有的物价亦相差悬殊。原因与河西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兴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有密切联系,导致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起伏性的特点,并且贯穿于整个西汉中晚期。

2. 农业与经济

韦双龙《敦煌汉简所见几种农作物及相关问题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元狩二年(前121年)介绍了汉代敦煌地区几种农作物的概况,分析了敦煌农业发展的初步原因,并对敦煌农业初步发展进行了历史定位。柳春藩《汉代自耕农经济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根据汉简中的一些资料,探讨分析了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具体情况。包括自耕农经济的特点、自耕农一年的劳动收入、自耕农一年的消费支出情况以及汉代自耕农的范围。伊传宁《由敦煌汉简谷物簿所见》(《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通过敦煌汉简中所见到的有关谷物收支记录的简文,对汉代的账簿记录格式和财务审计工作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当时会计工作的进步性。

3. 买卖契约

王元林《敦煌、居延汉简契约论》(《简牍学研究》2002年)汉简中的契约原件,大多是有关衣物、布匹、谷物等的买卖契券,也有少量的土地买卖契券,还有借贷、雇佣、租赁契约,以及带有契约性质的出人取予文书和收受文书。文中对买卖、借贷、雇佣等契约作一考论。

(三)军事保障与防御

1. 后勤保障

费仙梅《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文博》2012年第2期)从敦煌汉简研究天凤三年王莽伐西域失利的原因是新莽政权在对西域军事行动中后勤补给存在很大的问题。战争的前期国家后勤物资准备匮乏以及伐西域路途险阻、

给养运输筹措困难的客观现实为军事行动埋下了隐患;战争中的给养筹措和补给的诸多困难直接导致了整个军事行动最终的失败。黄今言《秦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及其管理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 第 3 期)武器装备是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文中以简牍材料论证了秦汉时期武器的种类和它的时代特色、武器生产的部门及其要求、武器的储备与等管理问题。徐乐尧《汉简所见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 年)居延汉简与敦煌汉简揭示了汉代河西边塞的一整套防御组织状况。它包括有候望系统、屯兵系统、屯田系统、邮驿系统和军需系统。其中的军需系统,实际上就是汉代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根据汉简资料,河西汉代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主要设置了仓、库、阁三种机构。由于这三种机构的合理配置,各司其职,使长城的防御获得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2. 对敌防御措施

侯丕勋《“塞天田”制度考述》(《简牍学研究》1997 年)论述了“天田”的释义,“天田”的“沮治”、“耕画”与所使用工具,“虎落”“彊落”“县索”“矜柱”与“塞天田”的关系,“迹”“日迹”与“日迹簿”的关系以及“不日迹”和对失职吏卒的处罚。

(四)年代考释与术数

1. 年代考释

罗见今《敦煌马圈湾汉简年代考释》(《敦煌研究》2008 年第 1 期)考释了十七枚历谱残简、二十一枚月朔简和九枚年数简的年代,认为与今历不合的三枚纪年简历日书写有误。在这四十七枚简中对以前学者考定的十二枚简的年代提出质疑,指出其考释方法的疏漏。罗见今《敦煌汉简中历谱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 年第 3 期)综合应用历史、考古、历法、数学知识,对沙畹、马伯乐、罗振玉、王国维对历谱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地再研究,详述考释之过程,指出前人的四五处错误,证明新提出未被考证过的 269 号应为五凤二年(前 56 年),文末附复原的元康三年(前 63 年)历谱。罗见今、关守义《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敦煌研究》第 1 期)收集《疏简》一书中的十六例月朔简,来讨论有关的方法及其根据。刘飞飞《〈敦煌汉简〉所见西汉日历简释读订误》(《语文月刊》2009 年第 24 期)对《敦煌汉简》所见西汉纪年简按其致误原因,从原简图版清晰而整理者误释、原简图版模糊不清而整理者未释、原简图版不

清或未见而各版本释文不一三个方面,进行考证并推算补释,以为进一步研究西汉边塞文化提供准确的时日材料。张小锋《汉简与〈二十史朔闰表〉》记互异月日对校》(《简牍学研究》2002 年)文中采用“以简校简”“简表互校”的方法,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释文》三书所录汉简为对象,就汉简与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记载月日之歧异,进行讨论。殷光明《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敦煌学辑刊》1995 第 2 期)认为敦煌汉简中的太初历谱有 11 个年号,贯穿了元凤定历后的太初历施行时期,这些历谱为研究历书格式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并可以推算、校正、检验以前关于这一时期的朔闰表,从而解决时辰、节气、伏和腊在当时的发展和使用状况,也为了解太初历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而证实敦煌汉简历谱不仅对太初历法也对整个古代历法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2. “日书”研究

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第 1 期)对居延简、敦煌简中的“日书”残简从“建除”“择日”“生子”“占卜”方面加以讨论,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当时屯戍官兵的生活,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日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3. 术数研究

肖从礼《敦煌汉简易筮类文献辑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敦煌汉简》中收录的 387、388 和 1787 号简的内容与今本《周易》传文完全不同,根据简文表明西汉时易筮与日书有融合的现象。肖从礼另外一篇《由敦煌汉简中的候风简谈八卦与八风相配诸问题》(《简牍学研究》2014 年)利用敦煌汉简的候风简论述八卦与八风相配的问题,证明在西汉时期八风已与后天八卦相结合,并且用于候风占验,另外汉代还有四方与四卦相结合的形式,从甲骨刻辞中的析、因、彝、伏四方名与震、离、兑、坎四方卦名在词义上具有相近含义来看,汉代四方风名与四卦相结合的形式可能有更古老的来源。

(五)中西交通

敦煌汉简记载了汉王朝当时与西域的往来,所见国名有“车师”“焉耆”“乌孙”“尉犁”“鄯善”“卑陆”等。

1. 通过敦煌汉简对西域的综合研究

张德芳、李永良《关于敦煌汉简中西域史料的

几个问题》(大庭脩主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胡平生《敦煌马圈湾汉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辩证》(大庭脩主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对敦煌马圈湾汉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人物考证、文字释读、文意疏通、史实考订和文书性质认定等方面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

2. 汉与车师的战争

孙占宇《马圈湾汉简所见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就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5号探方所出简牍材料中有一批简文集中反映了王莽时期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文中大致推定出天凤三年至四年(16—17)的王骏征伐西域战争与王莽征伐西域战争无关。

3. 战争安全保障

程喜霖《敦煌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根据敦煌汉简证明战国至西汉为关传盛行的时代,汉武帝元鼎年间过所称谓出现,从关传中演变出名为过所的通行证,经过昭、宣、元、成四帝过所的使用逐渐广泛,整个西汉,吏民出入关卡主要使用传,同时期传与过所合而为一,而关传逐渐消亡,最后被过所而取代。

(六)文学与典籍

1. 汉简与汉代诗歌研究

许云和《敦煌汉简〈风雨诗〉试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重新释读并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敦煌汉简《风雨诗》,《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灾之深。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以及风俗地理诸问题。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风雨诗》应创作于东汉时期,抄写则当在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这廿年的时间内。

2. 汉赋研究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对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汉简(496A)作了考释,证明汉代已存在关于韩朋夫妇的故事。这不但究明了《搜神记》中关于韩朋夫妇的记载和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韩朋赋》的渊源所自,而且对研究汉代

通俗文艺的发达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石明秀《敦煌汉简所见汉赋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认为2253号敦煌汉简乃东汉前期屯田戍边佚名士卒即兴创作的一篇无题汉赋,该赋以戈壁大漠诡怪气象写景状物抒情,苦涩、牢骚而不失豪放,通篇贯穿个人身世之感、时事生存之感,真实反映了西陲边塞戍卒艰辛的军旅生活(就文学水准言,该无题小赋细腻地展现了戍边士卒的性情世界,生动入微地展示了其志不获伸、意不得抒的情结,展现了戍边士卒的生存环境、内心世界以及创作心态)。

3. 儒家文化

刘长东《孔子项託相问事考论——以敦煌汉文本〈孔子项託相问书〉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以敦煌汉文本《孔子项託相问书》为中心,考论了项託的姓名里籍、事迹及其文化形象,项託的神格化,《孔子项託相问书》的民间性及其文化内涵等问题。

4. 总论文学

赵逵夫《从敦煌遗书与汉简看口传在古代文学传播中的作用》(《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6期)敦煌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发现,使我们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考虑到了社会传播的因素,注意到了民间口传同民间书传结合造成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七)医药医方

1. 用药

范新俊《敦煌汉简医方用药小议》(《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年第9期)从《流沙坠简方》《居延简方》《敦煌汉简医方》中,就其用药之法度,进行了论述。

孙其斌、袁仁智《敦煌汉简中的医药简探讨》(《西部中医药》2014年第11期)以敦煌汉简图版为底本,参考《敦煌汉简》释文,对其中的20枚医药简进行解读,从中发现西汉末期中医学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在外感伤寒病的辨证施治方面达到了一定水平,指出在汉简中首次出现了“黄帝”和“针”的名词。

2. 兽医

周祖亮《汉简兽医资料及其价值述略》(《学行堂文史集刊》2011年第1期)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等汉代医药简文中,有少量兽医方和与兽医内容相关联的资料,记录了牛马等牲畜的疾病种类和治疗处方。通过对汉简兽医方的梳理

并联系其他相关出土文献,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汉代兽医学成就和出土兽医文献的价值。

(八)屯戍军粮管理

敦煌汉简的内容多与屯戍有关,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根据简文的记载恢复当时的烽燧系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出土的汉简又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酥油土简文“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过伦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写重案候官亭燧”,表明了敦煌中部都尉下属四个候官的名称和系列。

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军粮管理措施述论——以汉简资料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以河西出土简牍材料为核心,围绕屯戍系统的日常粮食事务,主要从量具运用的规范化、纳入支出的程序化、严防漏洞的律令化、管理实践的会计化以及各类审核的制度化等方面,对军粮的日常管理措施进行了述论,以期在传世史料对此极为缺载的情况下对此历史细节有所补充。赵岩《也论简牍所见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认为学者们对简牍所见汉代仓制的认识存在一些错误,进行了补充纠正。主要集中在居延仓的驻地在居延都尉府,而不在瓦因托尼;汉简中所见的部仓还有卅井候官的孤山燧仓,第廿六仓、第廿五仓是燧仓而不是部仓;候官仓不存在仓长及丞,屯戍系统仓的管理离不开候、将、转、守、尉、士吏、令史、尉史、候长、候史、燧长、燧卒等传统意义上非仓人员的参与;廩给程序中所谓“下发通知”是不存在的,仓的等级考核在汉简中也没有体现等方面。

(九)地名考释

冯小琴《居延敦煌汉简所见汉代的“邑”》(《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据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文书,就其中“邑”名一并列出,并就与之相关的小问题,进行简单论述。

陈文豪《“文德”地名考释》(《简牍学研究》1998年)就“敦煌”改名“文德”的理论意义、“文德”之名使用年代上下限的推测、“文德”易名为“敦德”原因做了推测。

(十)其他方面

汪贵海《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提出汉人逃亡匈奴之三种情况:一是因故没入匈奴之吏卒之子孙不堪贫

困,投奔其身匈奴之亲戚者;二是边人奴婢难忍煎熬者因近匈奴地而亡入;三是触犯律令之盗贼为彻底摆脱受追捕之窘迫境地而亡入匈奴。邓天珍、张俊民《敦煌汉简札记》(《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对近期连续发表的几篇研究敦煌汉简的文章,对于认识汉代的敦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看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如“徙民”并非“徙民”,二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囚徒在服役期满或赦免后室可以回归故里的而非相反;一棵树烽燧出土的“侦候符信”是晋代的封检;另外“浮屠简”的释文需重新解读,提出了商榷。

谢璞、张俊民《对敦煌汉简一条简文两个问题的理解》(《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对敦煌汉简中简143的“三节”“泉都”两个地名做一分析,认为前者是属于宜禾都尉辖区的一个地名,后者则是王莽时更西汉“煎都”所致,“节”的确认对于汉代敦煌史地的认识是一个重要补充。李岩云《敦煌汉简相关问题补遗》^[3]公布了1998年在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五枚木简,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述,并对汉简涉及的“出入关刺”“关守候”“匈奴译”等问题作了考证和补遗。张俊民《〈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4]就敦煌汉简的定义、文献考释、简文的引用、转述他人的观点方面,另外还有后记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与《竹木春秋》作者王震亚进行商榷。

上述是敦煌汉简发现以来20多年的总体研究状况,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简牍的论文中涉及到了敦煌汉简,此不再一一罗列。敦煌汉简近20年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小学”、书法、相关历史问题等的研究都十分详实。因本人水平有限,整理过程中的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魏德胜.《敦煌汉简》中的量词[J].古汉语研究,2000,(2).
- [2]杨艳辉,张显成.敦煌汉简的异体字兼论异体字的认定问题[J].中国文字研究,2007,(2).
- [3]李岩云.敦煌汉简相关问题补遗[J].敦煌研究,2010,(3).
- [4]张俊民.《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J].敦煌学辑刊,1999,(2).

(责任编辑:王珏)